

[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理论探究 ]

##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社会工作： 理论与实践反思\*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熊跃根

**摘 要：**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一种哲学话语和新的思考方式，后现代主义不仅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理论假设与实践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对社会工作专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专业的知识基础和价值观，以及实践模式的本土化等。要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发展，既要吸收已有的知识传统与实践经验，也要质疑和反思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将伦理反思与实践理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后现代主义给予我们的重要启迪。

**关键词：**社会工作 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 理论与实践

作为一门学科和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发端于 19 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当时欧美国家普遍受贫困问题的困扰，而社会上盛行的是功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这种背景下，早期的社会工作专业建立了强调个人自立的价值观和以临床医学经验为基础的实践模式与知识基础。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知识基础和实践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本质上说，社会工作专

\* 本文初稿完成于 2004 年夏，后经过修改和不经意的“冷冻”至今已有一年余，论文的写作受益于不同场合与一些学人的讨论，笔者在此表示感谢。过去几年笔者一直在北大为本科生讲授“社会工作概论”课程，论文的一些观点也部分从该课程的教学经验中得到启发。然而，论文中存在的不足与纰漏完全由作者本人负责。



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今天这个充满社会转型和急剧变革的时代里，在后现代主义这一标志性旗号的影响下也面临“拷问”历史和重新审视真理的选择。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一样，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同样也面临发展的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重新反思和认识社会工作确立起来的知识基础非常必要，而且对我们这样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来说，思考如何确定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方向更显得非常急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或理论叙述对社会工作专业内部的学理和实践讨论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讨论不仅触及当代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实践的发展，也为未来社会工作（包括社会政策）的发展走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Lash, 1990; McBeath & Webb, 1991; Hartman, 1994; Howe, 1994; Parton, 1994, 1996; Pease & Fook, 1999; 熊跃根, 2002, 2004; 张和清, 2003）。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方面对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务模式提出了质疑，要求人们对专业范围内的主要论争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知识和理论建构本身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入侵，学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态度与立场莫衷一是。支持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为社会工作开启了一扇崭新的窗口，使得专业人员重新认识自我和受助者的位置与价值关联，反省社会工作传统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并认真思考知识领域内的批评与权力之间的关系（Hartman, 1994）；而反对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几乎是一副颠覆或错乱的迷幻剂，它造就的是一种对知识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景象，引发了专业人员对专业信念与实践有效性的怀疑（Atherton & Bolland, 2002）。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时期，社会工作专业正在探寻规范发展和本土化模式的起步阶段，因此，了解并从本质上认识源自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与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梳理不同时期社会工作领域内价值理念与理论要素的变化及其对实践模式的影响，对澄清社会工作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哲学观念，促进我国本土化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应是有帮助的。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第一，阐释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主要表现；第二，澄清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不同层面的影响；第三，评价并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发展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的借鉴意义。



## 一 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内涵及其 在社会科学中的反映

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最早文献是1926年天主教神学家伯纳德·J. 贝尔的著作《后现代主义及相关论文》(*Postmodernism and Other Essays*)，在书中贝尔将后现代主义表述为一种超越了现时代基于理性与自由的信仰，它预示着一种整体性的思想和时代(Drolet, 2004: 4)。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文学与艺术圈内开始流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股源自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几乎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后现代的(Postmodern)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三个经常出现但又彼此不同的术语，然而在不同学科内部，在不同专业范围的作品里，这些术语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其内涵和相关争论不仅复杂，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现代性的发展是随时间变迁而改变的，因此，在探讨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解现代性的内涵与特征。

### (一)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内涵

“现代性”或“现代”是指一种当下(或现时)的体验或现存的状态，同时它还是时代意识和精神状况特征的反映。在法语里“现代性”(Modernité)被理解为现代生活质量，它产生非连续性的时间意义，它同传统保持断裂，对现实充满新奇的感觉，并对生命的短暂深含敏锐之感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体验短暂性和偶然性(Frisby, 1985)。在当代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看来，要理解“现代性”这一问题，人们必须回到黑格尔，因为哈氏认为黑格尔不仅是第一位清楚阐释现代性的哲学家，也是深刻揭示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与现代性关联的思想者(哈贝马斯, 2004: 1~23)。在知识的范畴里，“现代性”是指以科学尤其是以自然科学理性为基础的一种知识状态。而对社会科学来说，“现代性”则表明了它与工具理性和科学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就本质而言，“现代性”是没有明显时间界限的，凡是同过去有区别的事物都可以被赋予现代的特性。与中世纪封建主义相比较，西方自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启蒙时代的文明标志着



现代性的诞生。然而，到今天，现代性的意义却是和当代的文明发展与精神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鲍曼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的基本特质是其“流动性”（Fluidity），社会变迁的背景决定现代性本身既是发展的同时也是不确定的。而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也指出：“尽人皆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状况并非一种终极状况”，在他看来，生活世界的变化性是不可避免的（雅斯贝斯，1997）。作为工业主义文明发展的结果，现代性本身表现出两个最基本的核心要素，即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所展示的客观性和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理性。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上述两个过程，它们主导着政府治理实践的发展进程。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就现代性的本质做出过一种近乎悖论的说明，在他看来，现代性现象的本质是它根本就没有本质。

时代的转变与流动令“现代性”本身置于一种变化的环境中，而在跨越时间—空间的情形下，“现代性”的精神链条和存在的基础摇摇欲坠，人们的认识和判断被蒙上一层面纱，其背后隐藏的是对真实（或真理）的怀疑、对宏大理论以及统一意识的拒绝。就“后现代性”而言，它的意义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艺术的领域内有不同的反映，其基本的内涵是指一种不同的事物（与过去或传统的区别），且有着某种特殊性，与一般化的特质不同。

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认识方式，“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无疑也是十分丰富的，要准确地给它下定义并非易事。针对后现代主义起源，通常人们将其理解为左派的一种政治学思潮，同时它又经常与鲍德里亚、鲍曼、福柯、詹明信和利奥塔等思想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这一术语在使用时却含有不同甚至经常是保守的意义，因为它将西方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看作为西方总体文明衰落的表征（Drolet, 2004: 4）。在《后现代主义读本：基础文本》（*The Postmodernism Reader: Foundational Texts*）一书中，编者迈克尔·图勒特指出，尽管理解后现代主义要将其放在浪漫主义与经典主义的叙述中来加以讨论，但是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概念本身的历史却是和神学、文学批评、历史学以及建筑学等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Drolet, 2004: 2）。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两本书中分别表达了对后现代主



义的隐忧，他认为在后现代阶段社会里“自我”被新的文化模式消融，而新的文化意识却无所顾忌地跨越边界，形成了深层次的制度困境，这是社会学家比较早地系统阐释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批评（Bell, 1973, 1976）。

## （二）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

作为一场文化变迁运动，后现代主义在建筑和艺术领域内经常被理解为推陈出新和抛弃旧的美学范式的种种努力。而作为一种哲学运动，后现代主义则更多是在思考人类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它主要从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发展提出了警示；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发展着对社会理论的建构；作为一种认识和参与世界的方法，后现代主义也影响着社会科学家在决策过程中的态度、方式与作用。因此，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是十分紧密的。

### 1. 现代性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

源于启蒙经验，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在过去一直成为西方文明的主导知识模式，其基本假设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和科学的客观性之基础上，认为真理具有某种普适性，同时对世界的认识可以通过一般化的推理与复制来完成。由于科学长期以来在人类知识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基于科学理性的话语模式对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自牛顿经典力学创立以来，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诞生带有深重的自然科学烙印。基于实验和测量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基于思辨的康德主义哲学思想，都对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与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成为区分不同的认识和研究世界的系统方法，也影响着日后知识的建构、积累与传播。在很长的时间内，现代性在社会科学内部所展示的是以理性和客观性为主导的知识链条。在人类科学和知识发展的历程中，现代性确立了有关真理、普遍性、统一性和权威性等基本要素，它们对社会科学家判定和处理社会问题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内部，人们相信由理性和科学原则建立起来的探求世界的方法，并倾向于将结果一般化。而在理论的建立方面，社会科学家也经常把宏大理论当成至高目标。



## 2.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待科学的看法表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坚持科学的普遍性和真理的唯一性,而后者中的一个定位是它对有关适用于人类普遍的、基本的主题和共同的现代观念进行挑战,这一点正好同社会主义信念中反抗西方殖民的秩序统治和文明单极化的发展历史不谋而合。同现代性理论叙述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以犀利的声音反对宏大叙事与对世界的总体性认识的正统性,它试图透过质疑与反思来审视过去已经建立的知识路径。作为当代最显著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有关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指出,对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总体化的叙述是徒劳无益的,在他看来,人(或人类)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复杂和多样性的世界获得某种知识,因为世界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所展示的不是整体趋势而是内容丰富的主体间性。

同时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理论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后现代社会理论”坚持从多元的视角来重新认识社会世界,摆脱传统的白人种族中心的思维模式,将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要素纳入到人类群体特质和相关社会问题的分析当中(Benhabib, 1984, 1987, 1992)。就后现代性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言,福柯的著作给予了清晰的展示和说明,其思想也对主流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对权力—知识关系以及对话语分析所做的理论诠释,集中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般框架(Agger, 1991)。在福柯眼里,“权力”绝不只是单指一种政治权力,而是泛指一种普遍存在的作用于人的能量,它不仅起着压抑作用,还可以发挥创造功能。在其多部著作当中,福柯不仅论述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也深入讨论了知识发展与权力的关联。在福柯1971年出版的《话语的秩序》一书中,福柯讨论了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在他看来,在任何社会里,只要话语产生了,它就会受到一系列程序的影响,这些程序包括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等。福柯认为,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power-free)的话语,也不可能用这样一种话语来推行批判。就知识发展与权力二者关系而言,福柯认为,权力既可生产事实,又能生产实践,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共生关系。权力既可以促进也能阻碍知识的发展,知识亦强化或削弱权力的作用,权力在知识的生产、记录、传播、置换



和使用等方面打上了自身的烙印。福柯还认为，在知识经历使用、分配和保留等过程之后，权力也仍然在发挥自身的作用。近年来，社会工作领域，学者和研究者也充分认识到福柯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元素同社会工作实践的联系，这些论述充分将过去正统的专业理论、伦理原则和方法置于开放的批评当中（Chambon, Irving & Epstein, 1999）。就福柯而言，其后现代主义思想具体体现在其反对将知识建立在普遍和统一的真理认识之基础之上。他认为，知识或真理本身要追溯到不同的话语/实践的情境中去，其强调的真理或知识建构的相对性与库恩提出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范式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就知识而言，福柯更注重的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实践经验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这一点对我们深入理解变迁的社会环境中不同弱势群体的语言、行为、价值观和需要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质是它坚持对“差异”和“文化相对性”的认同（Derrida, 1978）。同时，后现代主义拒绝用单一的声音来叙述真理或事实，它主张用多元的方法通过多种途径来认识世界的特殊性，主张对科学采取“去统一化”的态度（Agger, 1991）。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研究日常生活形态和对地方性（或局部）知识的解释方面，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传播、妇女研究等领域，它都显著地具有自身的价值（罗斯诺，1998：122~139）。后现代主义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经常是通过对其“问题化”从而使个体经验进入公共政策和治理的范畴，从而引起大众对社会问题的警觉。尽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不一致，但它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仍有不可忽视的贡献，这些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方法论上的贡献、经验研究方面的贡献和概念形成上的贡献。而上述三方面都会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认真探索并反思后现代主义对包括社会工作专业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积极作用，对我们认识并参与社会治理是有帮助的。

##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同时它的出现也是与19世纪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联系在一起。作为一门学科和



专业，社会工作在确立专业地位前就受到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强烈影响，其最早确定的是对家庭和社区问题的有目的性的干预，而这些问题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工业化初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而其中以城市贫困问题为最明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工作涉及更多的是同“社会领域”中的个人与家庭的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各国，应对社会问题的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建立。从学科和专业性质来看，社会工作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如医学、法律、精神病学等学科对社会工作的强烈影响。由于受到医学模式和规范社会学的影响，早期社会工作的实践基本上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个人治疗为主，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实践助人方法背后的价值理念，主张受助者个人的自立和自助一直以来都成为社会工作伦理的重要元素。本质上而言，社会工作是一门处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专业与学科，尤其是要处理那些处于不利境地的人群与社会系统的各种关系，其理论与实践反映了时代的变革与社会要求。

### （一）社会工作与现代性

社会工作的现代性一方面同这门专业早期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也与福利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首先，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造就了社会工作专业，而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科学的发展也对社会工作的实践方法和理念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道德带有极端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将贫困视为个人的品德失败或道德缺陷，这一带有偏见的判断成为日后重建社会秩序的前提。而自19世纪末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进步，对社会工作的知识领域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社会工作者的出现与知识的生产受到了来自医学传统与民间慈善组织实践发展的双重影响，在逐渐获得合法性后，社会工作这一专业与学科又试图在社会科学内部建立自身的别样性，以此作为专业的标志。由于受到科学和应用性专业的影响，早期工作者在实践中非常强调科学的理性和管理规范统一，在知识的建构与真理的认识方面，绝对主义和客观性成为主导实践模式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社会福利被当作是一种矫





正个人道德缺陷和家庭贫困的机制，政府的福利发展几乎都与正常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社会工作的现代性充分突出了控制与治疗的双重目标，而且它自从一开始就具有管理主义和标准化的特征（Howe, 1996）。在社会工作临床实践中，治疗师（个案工作者）与病人（受助者）之间的沟通过程充分展现了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内涵，即人们相信这样的真理：专家对病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二者是一种基于权力依附关系，病人（受助者）的语言可以准确地表达其自身的经验，而治疗师（个案工作者）也能准确地理解病人（受助者）的经验并制订出治疗或干预的方案。同时，在这种治疗或咨询过程当中，现代主义的本体论还认为，病人（受助者）的心理特征或人格是稳定的（Hansen, 2004）。

其次，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工作的现代性同福利国家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福利国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对公民生活和福利承担的全面介入，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逐渐成为一个处于无所不包的国家与社会期望值日益升高的个体二者之间的调节者（Parton, 1996）。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受到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影响，也更多受到来自国家法律、管理规则和政府科层制度的约束。社会福利的实践在福利国家内部表现为由过去的对受帮助者系统的控制，转向为对社会服务本身的技术管理，尤其是进入后福特主义和全面的市场经济时代以来，管理主义已经逐步取代了专业主义中助人的价值理念基础。个人的重要性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成本控制和工作者及其机构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话语系统也在发生变化，如管理语言的主导影响也已使传统的个案工作者逐步被个案管理者所取代（Walker, 2001）。豪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由于志愿部门的不断扩张以及分散化的预算控制和决策的盛行，在社会服务领域工作者们急切盼望新的思维方式并积极寻求创造性的服务提供方法，打破既有的传统模式就不可避免（Howe, 1994）。也有学者提出，由于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管理主义在社会服务领域中的推行，社会工作专业在现代社会中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科层化的专业”（Parton, 1996）。可以说，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后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说



社会工作早期的现代性是反思人类道德的缺陷与社会秩序之重要性的话，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当代社会工作就明显具有向科层化实践转向的特征。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社会工作的假设中隐含了实践模式所具有的普遍主义特征，它认为在不同范畴和情境下，综合的（generic）实践范式可以放之四海皆准。但是，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工作本质上应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专业实践，这也是现代社会工作的基础（Pinker, 1982）。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人口的异质性不断提高，人类的社会需要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显然，统一的、普遍主义的实践假设在社会工作领域内已不相适宜。从这个角度上讲，后现代主义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 （二）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

同过去相比，21 世纪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面临了十分迥异的环境。有学者指出，目前所处的“后福特主义时代”对这一专业而言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传统的实践范式也开始遭到质疑，改变政治—经济制度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成为当今激进社会工作实践的一个方向（Hugman, 2001）。同时，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和其他知识话语体系对社会工作这一道德实践的伦理、方法和实践模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工作理念和方法，这些影响着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建立与发展（Hugman, 2003）。其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伦理的影响。第二，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方法论的影响。第三，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临床实践和社会政策的影响。在临床实践领域，后现代主义对叙述治疗/家庭治疗等实践模式的价值观和治疗方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宏观实践层面，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的制订和推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对多元化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公平与正义的认识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社会工作的实践基础是受医学模式影响的个案工作，同时在心理分析流派的影响下也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心理辅导实践模式，上述实践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专业工作者（心



理辅导或治疗师)在帮助受助对象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他或她相信自身不仅能客观理解受助者的语言叙述及其背后反映的问题,而且还相信自身能够帮助受助者减轻情绪的困扰并改善受助者的行为模式。长期以来,基于现代科学理性的知识论将个案工作和心理辅导的实践固定在观察者—被观察者、治疗师—病人之间的不平衡权力关系框架内。由于专业人员和受助者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代表权威的一方总是趋向于控制话语,并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知识本身进行界定。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有学者明确指出,受助者(或案主)是诠释其个人事物的终极来源,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依赖受助对象对其经验的描述(Reynolds, 1934)。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工作专业领域有专家更突出强调受助者生活经验与轨迹、语言系统的重要性。因为在工作者干预之前,受助者的叙述(语言实践)构成了一道不可忽视的藩篱,专业工作者必须越过它才可能理解受助者生活世界及其背后的意义。后现代主义通过对普遍性知识和统一化的界定进行质疑与批判,向社会工作者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传达了以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如何思考同时介入受助者的“日常生活世界”?第二,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诠释和干预过程中运用“自我的技术”(Technology of self)?对于上述问题,福柯有关知识—权力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推断出,社会工作者的“自我认同”(或专业自我)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专业实践发展过程中理性化的自然后果,而是受助者生活经验(日常知识)与福利实践中的权力关系共同发生作用的后果。正如福柯指出的,在特定话语体系中传输的知识是在控制—服从的互动关系中不断被生成、被强化和被实践着,国家权力机制制造的普遍性知识成为一种可操控的鉴别和分类工具,在这一体系内,不仅确定了处于不利境地的“无名者”的生活世界,同时也形塑了专家—受助者的等级关系(Foucault, 1980)。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经常面对的是被忽视的和被边缘化的弱势人群,他们的问题和需要不断被“正常化”机制所控制,在儿童福利、精神障碍、残疾康复等社会服务领域里矫正性的实践不经意使受助对象的内在声音和潜能被抹杀(这对我们反思机构照顾的种种弊端和努力推行社区照顾的模式很有启发意义),按照福柯的说法,这都是现代社会制度与社会服务机构



交互作用的结果，受助对象（Clients）从福利主体演化为既有福利体制中的“顾客”（Customers）。因此，作为助人的专业工作者，在实践中必须注意到权力关系对专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要注意到，在社会福利领域，由于国家治理机制的无所不在，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实践之间的一分为二的专业边界不复存在，它也提醒专业工作者要发展出整合性的实践知识与技能。

正如福柯指出的，临床医学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医生对症状的目视（Looking）与推断，在这一过程中病人的空间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医生—病人的关系被封闭在诊所的范畴，病人的真正生活世界变得毫无意义。而对社会工作的临床实践而言，实践知识更多是决定于专业工作者的聆听与分析，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受助者的生活世界是在叙述、提问和不断被澄清的环境下被赋予意义，专业人员追寻的线索是那些听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指向的记忆碎片，而受助者的真正问题与需要很可能在漫长的叙述—聆听过程中被忽视。同时，作为一门性别化的专业，社会工作与高比例的女性从业人员和女性受助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女性的话语和感受在专业实践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使临床实践变得异常敏感（Gorman, 1993; Hartman, 1991, 1994）。就咨询实践而言，一个对咨询师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是：在咨询师—受助者（或病人）之间的语言沟通能否促成对“真理”的探究？咨询师是否能够真正地理解受助者的语言？在临床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叙述治疗（Narrative therapy）是一种备受关注的实践，然而近年来学者从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这一实践的基本假设进行了挑战，指出传统治疗实践存在的盲点，因为治疗师往往忽视了这样一点：在本质上治疗是一种基于权力关系的政治活动（Besley, 2002）。关于这一点，正好也响应了利奥塔所言，“说话就是一种斗争。语言是普遍的竞技”（利奥塔，1997：18）。当今在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包括个案工作（或心理辅导实践）、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后现代主义对上述实践方法的基本假设与实践理念都提出了挑战。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影响着社会工作的实践，它对社会政策（或社会福利）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有学者提出应就“后现代社会政策”本身进行积极的反思（Carter, 1998）。后



现代主义对社会政策的启示意义在于，它提醒政策制定者对传统社会福利的二元假设进行必要的质疑，而社会福利服务的正常化和审查的实践也应重新进行反思。在福利国家内部，混合经济的社会福利服务发展模式，也促使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领域有新的理解，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福利服务的扩张。

在学科体系内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实践与研究方法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进入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研究的实践发展。后现代主义对非二元化思考的推崇、强调主观价值与个人化的感受、注重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实践的价值，不断提醒社会工作者要在理论研究和分析资料过程中，要特别留意对受助者日常生活的解释，同时要注重对个人经验的理解，反对轻率的一般化的理论解释。近年来，叙述分析成为临床社会工作领域探究问题和寻求问题解决策略的一个突出方法，它和社会工作微观实践本身作为一种高度个人化、情绪化和与生命故事相联系的工作经验的特质十分契合（Gorman, 1993; Besley, 2002）。在实践过程中，后现代主义还告诫专业人员，应该试图在工作中努力解除“专家—病人（案主）”的权力依附关系，主张社会工作者多倾听和辨别受助者的不同声音。然而，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语言在沟通过程中的张力和局限性。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伦理思潮，它不仅影响着社会工作的一般实践，对社会工作专业未来使命和意义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的影响一方面表明了当今不同专业实践边界的打破，另一方面它也清楚地展示了专业内部工作者对传统“实践理性”和“实践语言”的反思，现代性强调的是专业知识和技巧的持续性与一致性，而后现代的视野则充分接纳差异性与多元性。在实践中，社会工作专业探求知识的方式与语言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追求变化和多样性得到了丰富的展现，追求多元文化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也是当今专业领域重点倡导和推进的目标。

### （三）社会工作的想像力与后现代社会福利的形成

近半个世纪前，C. 赖特·米尔斯针对美国社会学发展的现状与困



境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社会学家要通过反思过去的学科传统并摆脱狭隘的专业视野，从而在创新的基础上重新塑造社会学的想像力。今天看来，米尔斯的论述不仅对社会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启迪意义，对社会工作的学科发展也同样有深刻的参照意义。

### 1. 社会工作的想像力

在米尔斯眼里，社会学的想像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是一种通过信息认识局部与总体关系的能力（米尔斯，2001：3）。在笔者看来，米尔斯对社会学学科特质的判断也可以用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识与理解。对社会工作来说，这门专业和学科的知识基础传统上受到医学模式和心理学的深远影响，认识和实践模式都已经形成较强的经验主义色彩，而特定价值观的形塑使得其实践上不断遭遇困境。因此，突破传统的知识框架和认识视野，建立社会工作的学科想像力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其知识基础和伦理体系在今天都与早期有了非常大的差异。作为一个直接回应社会变迁与社会问题的助人专业，社会工作决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既已建立的知识基础和实践方法，尤其是受医学模式和心理学影响深远的临床社会工作，必须将治疗和咨询与更为错综复杂以及日益变化的社会总体环境联系起来。在认识与分析个体心理和情绪问题时，必须将个人的问题特质与广泛存在的社会结构紧密加以结合。正如米尔斯所言，当私人困境与公共问题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产生了其特有的意义，社会问题就浮出水面，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也更需要深刻的智慧与实践技巧。

在西方社会工作发展不断遭遇困境时，针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推进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方法的进步，从知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建立“社会工作的想像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工作专业在西方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种族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工作专业在今天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变化多样的社会需要。

在笔者看来，能否建立“社会工作的想像力”，取决于我们在发展这个专业的时候，是否能突破既有的专业知识体系和学科藩篱，能



否对专业的知识与实践发展做出自我批评，能否从更为整体的层面上审视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和干预方法等。从过去一个多世纪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社会工作专业或学科的发展也应遵循开放的和更为包容的发展原则。因此，笔者总结以下几方面是建立“社会工作想像力”的基础：第一，在社会工作理论与知识基础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一种跨学科的视角，试图打破社会工作专业的狭隘的知识边界；第二，对社会工作过去的知识传统与实践方法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批判，对社会工作的学术与实践方法的批评保持开放性；第三，打破传统的社会工作临床与政策、微观与宏观的一贯分野，考虑并探究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实践方法的整体性和全局视角；第四，在社会工作知识基础方面，研究者和实践者们都要试图超越心理学的一般限制，并将社会干预与政治哲学紧密结合起来，注重总体社会情境和制度的变迁。

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而言，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的知识和经验方法基础上，本土化或地方化是一条建立“社会工作想像力”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专业只有在融进既有的社会文化体系里，与特定的制度情境结合起来，才真正有可能实现助人的效果与最终目的。

## 2. 后现代社会福利的形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福利被理解为一种给予穷人或弱势群体的物质、现金和服务方面的援助，而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社会福利体系逐渐演变为一种针对贫困阶层的调控机制。而当福利不再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时候，福利的正义性就开始被质疑。与此同时，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目标的社会政策一直被当作实现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社会福利在现代国家发展内部的经验经常同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提出，对社会福利或社会政策的宏大叙事以及主体论述应该放弃既有的先验假设和目标化的企图，应该避免福利制度发展趋同化的努力，而更应注重个别的差异和社会经验的独特性。在社会政策领域，研究者则应注意到不同的话语和声音。因此，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其目标应该同社会观念、生活方式、社会需要和文化形式的多样性、特别性和选择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同传统的社会福利发展特征（比如注重普遍主义的经验和模式）不同的是，后现代社会福利更多呈现的是特别性。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全球化和福利国家体制日益遭受困境的时期，后现代主义思潮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在一个一体化和统一的福利体制内部，注重差异与多样性对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其实更为重要（Mann, 1998）。在今天的欧洲，显然社会政策的目标与实践策略不能按照传统的假设与价值判断来实施，否则，新的社会运动就很可能打破既有的社会秩序，对社会和谐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最近发生在法国巴黎的种族骚乱其实很明显表明了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失败的原因）。在福利国家内部，后现代社会福利或后现代社会政策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同新的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和文化资源要素有紧密的关联。在这个社会变迁日益迅速的时期，对福利国家或福利体制的认同，后现代主义对人们的启示在于，强调统一性和同一性至少是不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对正确理解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也至关重要。

### 三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意义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阶段。而要解决社会问题，改善公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和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社会福利服务的开展和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还显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在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努力，在教育、实践和研究三个方面对国际上已经成型的理论与模式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学习，在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与模式的基础上，再结合本土的文化与制度特色探索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在今日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里，中国的发展显然不可能按照传统的路径和模式去推进，吸收并借鉴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发展经验，同时注重参照本国的文化和制度特色，在某些领域实行“跨越式”的实践发展，避免发达工业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和错误，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现代化及其发展模式，中国应该有自身的理解和发展策略。在发展社会工作和推进社会福利服务的道路上，我们也应该





对西方在过去一个多世纪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对既有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深入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富有启迪意义的窗。通过这一窗口，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寻求本土化的发展经验与模式，在教育、实践和研究三方面重新认识并总结自西方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概念、理论与实践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套符合本土化、制度情境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 （一）后现代主义对发展我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意义

随着全球化和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进程的加速，来自国际层面的文化意识、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必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工作专业是西方社会的历史产物，但也是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对中国来说，正确认识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在学习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建立并发展出本土的专业理论与实践模式。社会工作专业建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架构之中，工作者只有透过建构或解释才能了解他们的世界。而在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同方法和不同受助对象都会使专业人员的关注点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价值预设和治疗结果。社会工作是一门价值主导的专业，它有很强的价值介入，这一点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专业工作者对问题的界定。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对“问题是什么”、“是谁的问题”以及“如何界定问题”保持清醒的意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工作者如何诠释问题富有启发，它提醒专业人员在澄清和分析受助者的叙述时，应该注重说者（受助者）的权利，并肯定受助者自身的解释权。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建立与发展有积极的启示作用。首先，就确立社会工作专业的知识主体而言，如何认识自西方发展起来的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价值，如何将它们同本国的文化与制度结合起来显得十分重要。其次，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同时，要避免在专业发展中的“专业帝国主义”因素的负面影响，将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Midgley, 1983）。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必须积极肯定



本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价值,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敏感性的要素同时,努力促成本国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与发达国家同行就实践经验与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并在实践中抛弃西方—中国(或东西方)的传统二元假说。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建立发展的启示意义在于,它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建构保持了一种开放性的态度,这一点对中国建立自身的专业理论和知识体系尤为重要。西方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带有明显的种族和文化特征,在理论的假设和实践前提方面,同中国的本土文化都有显著的差异,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同时,要警惕强调普遍性和可移植性的盲目的“国际化”或“拿来主义”倾向。近年来国际社会工作界一直在讨论并探索有关社会工作实践的全球标准(Global standards)议题,这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特征,西方发达国家的专业团体和工作者认为推广国际化的社会工作理念与实践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这一做法仍然遭到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指出,建立并推广社会工作实践的全球标准,无疑是以另一种方式在专业领域内选择“总体叙述”和“普遍的范式”,是西方知识权力体系的重现,这值得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反思和深入批评(Williams and Sewpaul, 2004)。同时,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文化间交流的增强,作为一门传统上以白人种族为中心的助人专业,社会工作也不断要面对不同的族群和文化,这使得专业实践在文化认同上同过去也有了明显的不同,社会工作必须面对日益增加的华裔社群的问题与需要,它也改变了这一专业在问题认知和专业方法上的发展路径。关于民族认同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就北美地区的情况做出过论述(Tsang, 2001)。近年来在西方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中出现的“批判理论”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浪潮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影响,也显示出这一专业正在面临新一轮的话语体系和实践模式的挑战,它要求社会工作在面对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对立(个人与社会、受助者与政府、理论与实践)中做出更符合专业目标的抉择。

## (二) 后现代主义对推动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

社会工作是一门以特定制度—文化为基础的、以助人实践为本的



专业，它的实践性要求专业工作者和专业共同体在直接与间接两个层面，都必须注重受助群体与多元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在实践中必须对既有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进行再思考，在助人环境中倾听不同的声音，重新确定受助者的问题与需要。作为专业工作者，学习并理解受助者的话语系统，同时建立平等与民主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解决个人、家庭与社区的问题都显得十分重要。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对推动我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后现代主义促使专业教育工作者反省并认真对待该知识领域既已建立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从而在学习与借鉴的基础上，对课程计划、价值观导入、学生的专业训练和未来社会福利服务的规划抱有一种认识与批判的谨慎态度。社会工作教育作为一种反思实践，它要求教育者自身不断地对价值观、知识论和技巧等问题进行反省。更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真理与事实的多元面向（Multiple dimensions），提醒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对专家体系外的知识生成和传播保持高度的敏感，而普通人尤其是弱势人群的观念与智能以及地方化的知识对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推行实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在面对本土社会问题时，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情境和多样性，又无疑敦促专业工作者在推行专业方法时，对特定场景和特殊问题进行更为敏锐的观察，深入理解本土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和社会需要，从而避免轻易地将西方的治疗手段与政策模式生硬地移入到本土社会中；第三，后现代主义对待真理与知识的相对主义视角，对发展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有积极的意义，它反对将绝对真理和超然的实践方法直接嵌入充满异质文化的社会里，从而也摆脱了过去传统的单一方法与问题相互割裂的局面，在反思的基础上保持对实践模式的开放性，避免过度的经验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是当代社会科学论述的一种催化剂，它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对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进行反省，并促使人们在实践中保持更为开放的心态。对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关系，笔者认为有两点是应该清楚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总体上并未动摇基于理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也未发展出一种供人们参考的理论体系，但是它却在反思哲学的实践领域作出了贡献。因此，对于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内的种种涌动，我们不必惊慌失措。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对后现代主义本身保持清醒的态度，在促



进社会福利体制变革和改善社会福利服务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工作者都必须坚持必要的“目的—工具理性”的原则。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思维的方式,在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从一般化转向个体化以及从封闭社会转向风险社会的现时代里,它指出了社会科学知识与实践所遭遇的困境,然而后现代主义绝不是“一切皆合理”的行动纲领。后现代主义学说及其观点同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一条渐进和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科学和理性在建立和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不可盲目地祛除或解构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科学方法与助人模式的有效性。在发展我国自身的社会福利服务和社会政策模式上,我们要避免陷入轻易抛弃知识赖以存在的基础或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困境,这不仅无益于改善我国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决策模式,也有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进一步发展。

####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安东尼·吉登斯(2000):《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

·波林·罗斯诺(1998):《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戴维·弗里思比(2003):《现代性的碎片》,北京:商务印书馆。

大卫·格里芬(1998):《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黑格尔(2001):《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卡尔·雅斯贝斯(1997):《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利奥塔(1997):《后现代状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 赖特·米尔斯(2001):《社会学的想像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尼格尔·多德(2002):《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齐格蒙特·鲍曼(2003):《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熊跃根(2002):“公/私二分法与福利国家的性别化:西方社会工作的现代性思考”,《长沙社会工作学院学报》,第6期。



熊跃根 (2004): “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建构”, 载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于尔根·哈贝马斯 (2004):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南京: 译林出版社。

张和清 (2003): “专业的确信与后现代视角下的社会工作”,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第3期。

Ågger, B.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105 ~ 31.

Applegate, J. S. (2000). Theory as story: A postmodern tale,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Vol. 28, Issue 2.

Atherton, C. R. and Bolland, K. A. (2002). Postmodernism: A dangerous illusion for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45, Issue 4.

Bell, D.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Bell, D. (197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Benhabib, S. (1984). Epistemologies of Postmodernism. *New German Critique*, 33: 103 ~ 26.

Benhabib, S. (1987).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enhabib, S.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sley, A. C. (2002). Foucault and the turn to narrative therapy.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Vol. 30, No. 2: 125 ~ 143.

Carter, J. (1998). Postmodernity and welfare: When worlds collid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2 (2), June: 101 ~ 115.

Chambon, A. S., Irving, A. and Epstein, L. (Eds.). (1999). *Reading Foucault for Social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amianakis, T. (2001). Postmodernism, spirituality, and the creative writing proces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Families in Society*, Vol. 82, Issu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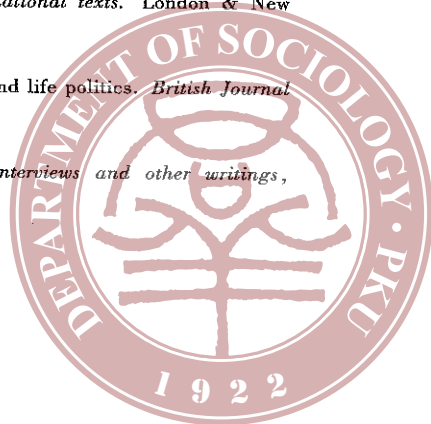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cherty, T. (1993). *Postmodernism: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rolet, M. (2004). *The postmodernism reader: foundational tex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Ferguson, H. (2001). Social work, individualization and life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31, Iss. 1.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risby, D. (1985).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iddens, A. (1990).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ssie, W. (1997). Postmodernism: What one needs to know, *Zygon*, Vol. 32, No. 1.

Gorman, J. (1993). Postmodernism and 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social work. *Affilia: Journal of Women & Social Work*, Vol. 8, Issue 3.

Hansen, J. T. (2004). Thoughts on knowing: Epistemic implications of counseling practi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Spring, Vol. 82: 131 ~ 138.

Hartman, A. (1991). Words create words. *Social Work*, 36, 275 ~ 276.

Hartman, A. (1994). *Reflection & Controversy: Essays on Social Work*.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Hickman, L. A. (2004). Pragmat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 citizenship, *Metaphilosophy*, Vol. 35, Nos. 1/2.

Hillyard, P. and Watson, S. (1996). Postmodern social polic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5 (3), 321 ~ 46.

Horowitz, J. (1998).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work theory,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Winter, Vol. 26 Issue 4.

Howe, D. (1994).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4, 513 ~ 532.

Howe, D. (1996). Surface and depth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N. Parton (Ed.). *Social Theory,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Work—The State of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Hugman, R. (2001). Post-welfare social work? Reconsidering post-modernism, post-fordism and social work educati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Vol. 20, No. 3, 321 ~ 333.

Hugman, R. (2003).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ethics in social work: Reconsidering postmodern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3, 1025 ~ 1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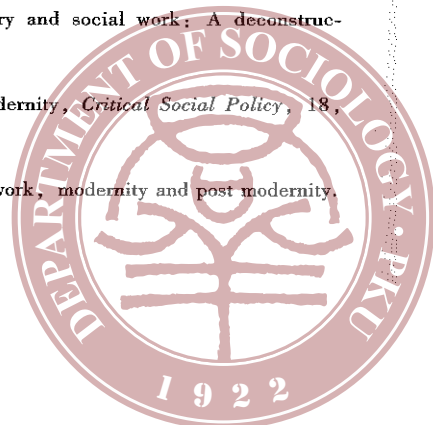
Jenkins, K. (2000). A postmodern reply to Perez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39.

Lash, S. (1990).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Latting, J. K. (1995). Postmodern feminist theory and social work: A deconstruction, *Social Work*, Vol. 40, Issue 6.

Mann, K. (1998). The welfare state and postmodernity,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8, 1, pp. 85 ~ 93.

McBeath, G. B. and Webb, S. A. (1991). Social work, modernity and post modernity.



*Sociological Review*, 39 (4): 745 ~ 762.

Midgley, J. (1983). *Professional Imperialism: 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Heinemann.

Pardeck, J. T., Murphy, J. W. and Choi, J. M. (1994). Some Implications of Post-modernism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Vol. 39, Issue 4.

Parton, N. (1994). The nature of social work under conditions of (post) modernity, *Social Work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 5, (2): 93 ~ 112.

Parton, N. (1996). Social theory,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work: an introduction, in N. Parton (Ed.). *Social Theory,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Work: The State of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Pinker, R. (1982). Social work in casework, in Philpot, T. (Ed.). *A New Direction for Social Work: The Barclay Report and Its Implications*. Sutton, Surrey: Community Care.

Pease, B. and Fook, J. (1999). Postmodern critical theory and emancipatory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Pease, B. and Fook, J. (Eds.). *Transforming Social Work Practice: Postmodern Critical Perspective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Reynolds, B. C. (1934). Between client and community: A study in responsibilities in social casework,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5 (1).

Sanders, R. C. and Nuccio, K. (1992). Postmodern feminist theory and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37 (6): 489 ~ 493.

Trainor, B. (2002). Post-modernism, truth and social work, *Australian Social Work*, Vol. 55, Issue 3.

Tsang, K. A. (2001).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North American social work literature: A dossi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Social Work*, 46 (3): 229 ~ 243.

Ungar, M. (2004). Surviving as a postmodern social worker: Two Ps and three Rs of direct practice. *Social Work*, 49 (3): 496.

Walker, S. (2001). Tracing the contours of postmodern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1, 29 ~ 39.

Williams, L. and Sewpaul, V. (2004).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 standards setting. *Social Work Education*, 23, 5, 555 ~ 565.



##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Work: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Xiong Yuege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ideas of postmodernism profoundly influence both theories and practice models of social work since 1980s.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s of impact of postmodernism on social work profession and interprets those new changes related to the paradigm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 models in the fiel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s a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and thinking mode, postmodernism not onl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social work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but also raises a series of daringly valuable questions regarding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as a profess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core value of postmodernism for social work is its proposal of a necessary linkage between ethical 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Key words:** social work,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theories and practice.

